

〔英〕 叶 念 伦

旅
外
文
丛

瞬息年华

SOBRIETY IS YOUTH



瞬息年华

〔英国〕 叶 念 伦



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

1991 北京

责任编辑 徐天铎
题头篆刻 前进
装帧设计 曹全弘

瞬息年华

〔英〕 叶念伦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4}$ · 5 · 110,900

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
ISBN 7-5057-0358-7/ I · 194 定价: 3.00元

目 录

- (1) 一个中国农民在国外
(19) 投保单
(27) 鬼佬儿
(41) 假婚
(49) 叛逃者祭
(56) 瞬息年华
(150) 爵士夫人的日记



一个中国农民在国外

傍晚，在从城里的图书馆骑自行车回Y城大学的路上，我又经过了大学路拐角上的那间外卖店“Curry House”。“Curry”一词在英文中是“咖喱”的意思，在B国有很多印度餐馆，听说印度餐馆中几乎每样菜都少不了咖喱，所以我一直以为那是间印度外卖店。

我来B国自费留学已有几个月了。根据当年的通货膨胀率，负责外国留学生事务的B国文化协会，估算一个外国留学生那年至少需要四千镑才能维持生活。但我那年惟一的经济来源是Y城大学给我的六百六十镑奖学金。靠这点儿钱维持生活，外国人都认为是不可能的。但我以中国人的“特殊方式”来安排生活，居然也过了下来。当然，饭馆和外卖店绝不是我应该问津的地方。

但是也许由于那天早上只吃了一片面包，肚子早已咕咕叫了的缘故，我禁不住放慢车速，朝那间

外卖店多看了几眼。我突然发现在Curry House的旁边还有几个中文字“嘉利楼”，“嘉利”虽然很像Curry一词的发音，但却没有丝毫“咖喱”的意思，而是个在海外很典型的中国店牌子。这进一步勾起了我的兴趣，便停下了车。

店里已经掌灯，我可以清清楚楚地从外面看到，在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国矮老头儿。老头儿满脸堆笑，向我说了几句广东话。我知道他把我当成了香港学生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会说广东话，我是从北京来的。”

“哦，从北京来这里上学？”他带着惊异的声调说，“真是少见！”

我们就这样开始用英语聊了起来。

“想不想吃点儿什么？”他问。

我看了看墙上的菜谱，每个菜至少都在一镑以上，我知道这些不是我能吃的菜。为了不至于陷入窘境，我只好往别处扯。

“您也是从香港来的吗？”

“不，从广东来的，不过已经在B国待了五十年了，所以不会讲‘国语’。”久居海外的华人都把普通话叫“国语”。“我有个侄子，刚从广东来，他会讲。家亮！家亮！……”说着他转身往后面厨房里叫道。

“炒完这批菜就来。”老人把里边传出来的广东话译成英语给我听。

听说有个会讲普通话的人在里边，这个外卖店对我更具有吸引力了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等这批来买餐的顾客都打发走了，才从厨房里走出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，他腰间围着一条白围裙，上身穿着一件沾满油迹的花格子衬衫，袖子卷得高高

的。圆圆的腮帮，眼窝深陷，一副典型的广东人脸型。梳的不是B国男士中流行的中分头，也不是香港仔中流行的那种不男不女的披头士发型，而是一大绺头发搭在前额的偏分头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土味十足的中国年轻农民。

“你好啊！我姓富，叫富家亮。你呢？”他用听起来很别扭，但却听得懂的普通话对我说。

当他知道我在附近的大学里上学时，就开始叫我“大学生”了。

“你来到这里多久了？”我问。

“两年多了。这是我堂姐夫的店。这位老人是我的伯父。”他指着柜台边的老头儿说。

“来B国过得好吗？”

“咳，我们庄稼人反正到哪里都是干活儿，在国内修地球，在这里天天围着锅台转。”

“你去哪儿玩过吗？”

“上哪儿去啊，不会说英语，出门寸步难行。别人一周休息两天，我只有星期二才休息一天，如果出去，回来晚了老板还要骂。”

“老板不是你堂姐夫吗，还管得这么严？”

“这你还不懂吗？大学生，这里是资本主义社会，什么亲人不亲人，只有祖国来的人才是亲人。”

这时门开了，进来一个很干净利落、戴眼镜的中年人和两个穿学生装的小孩，一男一女。

“这就是我的老板，这是我的侄儿侄女。”富家亮指着进来的三个人向我介绍说。

我和他们用英语打了招呼。老板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，然后同富家亮说了几句广东话，就进厨房去了。我虽然听不懂

广东话，但他的眼光使我觉得他对富家亮这时站到柜台旁边似乎有些不满。

“好了，我现在很忙。”富家亮赶紧说，“这里见到一个祖国来的亲人很不容易，你把地址留下，我以后有空儿找你聊聊。你要吃什么东西吗？”

我知道我不能再多待了，匆匆留下了地址、电话，便告辞出来。

我和几个外国学生合租了大学路上的一栋房子，它离富家亮的外卖店只有几百码远。

星期二下午三点多钟，我正在二楼屋子里看书，听到有人按门铃，我从窗户往下看，是富家亮。

“大学生，快开门！”他笑着对我说，手里提着一大塑料袋的东西。

我赶快下去开了门。

“你们的厨房在哪里？”他劈头就问。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吃午饭啊！我还没吃午饭哩。”他神秘地笑着说。

我把他引进厨房。他打开塑料袋和我们的冰箱，从袋里拿出一大盒鸡蛋，一大包切好的新鲜牛肉、鸡肉，还有一瓶食用油。他把大部分食物放进冰箱里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给你吃啊！”他仍旧眯着眼笑着说。

“这怎么行呢。”

“咳，你们知识分子就爱假客气，什么行不行，我知道这些东西你是吃不到的。”

这倒是实话，自从到B国以来，一是由于学习忙，二是

由于钱很紧张，我从来不敢买了东西自己做饭，而是每天在学生食堂吃两餐。即使是比较便宜的学生伙食，我也不敢轻易买带肉的菜，而是用二三十个便士买个三明治。

但是现在看到这么多切好的新鲜肉和鸡蛋，马上就要吃到富家亮做的、我向往已久的中国菜了。这时他已利索地抄起平底锅放在煤气灶上了。

“你老板让你拿的吗？”我有点不安地问他。

“他哪里有那么好。他现在不在，已经回家了。”

“那合适吗？”

“什么合适不合适，老子一早晨起来干到这时才得点儿空，拿他点儿吃的算什么！”

“今天不是你休息吗，怎么还干活儿呢？”

“大学生啊，这里是资本主义社会，谋生难啊！我没有你那么高的文化，更不会说英语，在这里除了干中餐馆，别的什么也干不了。我在这里自己没有房子，吃、住都在店里，就得什么都给他干，这里的餐馆和外卖店的生意时间是中午两个小时和晚上，因为中午B国上班的人要出来吃午饭，晚上他们大都在酒吧喝酒，十点多钟酒吧关门了，他们出来买点东西吃，回家睡觉。我就住在店的楼上，每天一早就得起来为中午切菜备料，两点钟店里关门后我还要洗涮打扫。到了三点多，如果今天不是我休息，现在我还要为晚上开门备料。我从早上起床到现在还没吃饭，我也要吃饭嘛，来、来、来，大学生，咱们一块儿吃。”

说着，一锅香喷喷的洋葱炒牛肉丝已经倒进了盘子里。

这是我来B国第一次吃的一顿中国饭，真是香啊！我禁不住津津有味地大嚼起来，一下就吃了一多半。这时我才发现他吃得很慢很少，两眼不时地瞅着我，微笑地摇摇头，似

乎对我这种如饥似渴的姿态深表惊异和同情。

“你怎么不吃呢？”我放下手中的餐具问。

“哎，你多吃吧！我干了半天活儿，反倒没了胃口，只想坐一坐，喘口气。”说着他也放下餐具，长长地舒了口气，点上一支烟，一边悠闲地抽着，一边慢慢地说：

“再说这些菜我也吃腻了。这里中国餐馆和外卖店的菜除了肉就是肉，我想吃点儿青菜，又没工夫出去买。我们这个小城市不像L市，那里的中餐馆和外卖店可以用飞机从香港直接运些中国时令菜来，但是如果再运到这里，成本要比肉贵上几倍，所以我们这里吃不到真正祖国的东西。我们是靠这里的巴基斯坦人、印度人组织批发一些原料，无非是各种肉类。这样我们不得不在这几种肉上变着花样做出几十种菜，有的为了适合洋人的胃口，还得做得不中不西的。真正的好肉，像冰冻大虾，成本高，老板舍不得让我吃，他不在店里时就把大虾锁进雪柜里。你想，我成天吃的就是鸡肉、猪肉、牛肉、洋葱加米饭，怎么还吃得下去！”

那天下午我们谈了很久，我对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。

他来自广东省的一个侨乡。父亲和伯父兄弟两个。爷爷早年因为在家种地过不下去，漂洋过海，辗转来到B国。先帮人洗衣服，后来开起了中餐外卖店。他凭着中国农民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，逐渐积了点儿钱，后来把富家亮的伯父也接出来一起干。爷爷积劳成疾过世了，临死时嘱咐伯父，以后家业不管多大，要分给富家亮父亲家一半，要把子侄们供到上大学。

富家亮伯父的家业越来越发展。

“因为中餐是世界上公认的餐桌珍品，”富家亮说，“而且一般来讲，中餐在这里也比西餐便宜，西餐一个菜至少两镑

以上。西餐馆一周只开五天，而中餐馆和外卖店就是逢中国的春节也不休息。西人有了钱就是吃喝玩乐，而中国人有了钱就是省吃俭用地攒起来，寄回家乡，光宗耀祖。”说着他把椅子向後一仰，挺起肚子，扬起眉毛，得意洋洋地长长“嗨”了一声，笑着又说：

“所以，像我伯父这样的中国小老头，你别看不起眼，其实很可能是个家藏万贯的百万富翁。别看那些西人神气十足，他们说不定还在吃政府的救济哩。”

富家亮的伯父在B国一待就是五十年，虽然早已取得了永久居留权，但一直没入B国籍，至今仍握着中国护照。

伯父老了，不能够操劳了，于是按照爷爷的嘱咐，把挣来的家业分了一半给自己的儿女。另外一半等着弟弟的长子富家亮来继承。

富家亮从1974年开始申请来B国继承财产。经过公社、县、省直到北京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，然后转到B国使馆申请签证，B国使馆再转回B国国内有关部门审批。一个中国穷乡僻壤的小农民，无权无势，当然也无“后门”可走，只得眼巴巴地等着。这样，他的申请在中国和B国足足旅行了四年才批下来。

申请最后能批下来，是富家亮一家没有想到的事。

“算了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一个中国小农民还想去B国继承产业，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家种地抱孩子吧。”家亮想。所以到了第三年尾，他就与一个农村姑娘结了婚，临出国时还生了个女儿。

富家亮的伯父这边也觉得富家亮来B国无望，自己年纪大了，实在不能全力操持剩下的一半店业了，又经不住自己儿女们的一再鼓动，便把另一份店业也给了自己的儿女。一

处是城里的大餐馆“柳园”，分给了二儿子；另一处就是这个“嘉利楼”外卖店，分给了大女儿。大女婿是从香港留学B国多年的大学生，为人精明。大女儿要操持家务，照顾两个孩子，“嘉利楼”的实权就全部落在了富家亮的堂姐夫手里。

伯父实际上是退休了，但是老头儿在家里又闲不住，于是一周三个晚上来给“嘉利楼”当个“楼面”（这是广东话，就是站柜台）挣上个三十镑钱。好在老人并不缺钱花，只不过找个地方消磨时间而已。

谁想最后富家亮来了，产业也分光了。老人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弟弟，本想把一半产业从儿女们手中要回来给富家亮，但老头已不是老板，只不过是女婿店里的一个小“楼面”。按照B国法律，他已无权再管这事。

到底是念过大学的女婿精于算计，他说富家亮新来乍到，对餐馆外卖业务不熟，又不会说英语，撑不起一半产业，最好先实践一个阶段再说，这样富家亮就在堂姐夫店里帮起工来。

“实际上，雇用亲戚比雇用外人上算得多。”富家亮说，“我堂姐夫店里，有个香港来的半工，只在晚上炒四个小时的菜，到时候就走，什么也不管，但工资和我一样，一周九十镑。剩下的活儿都是我干，从早到晚，不知多干多少，无非是白吃白住他的。他要请个外人干这么多活儿，白吃白住也得按钟点儿给钱。这里一个只管掌勺的大厨，周工资一般至少一百八十镑。我每天平均要给他炒五百来个菜，为他挣的钱付我一个月的工资都富有余！”他越说越激动，“真是剥削啊！他妈的，我拿他这点儿算什么，吃啊！”说着他狠狠地夹了一大口菜。

“你既然知道你在这里受剥削，为什么不回国去？”我问，

“在国内不管怎样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苦在一块儿也有甜头儿嘛，在这里连个能跟你说句知心话儿的人也没有。”

“唉……”他长长地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说，“大学生啊，你不懂啊！我们农民反正到哪儿都是干活儿吃饭，可是在‘四人帮’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想老老实实地种地都种不安稳啊。我们家乡是有名的橡胶之乡，但是那些年说要‘以粮为纲’，硬是把橡胶树都砍光了种水稻，一年抢种三季，把人累得个猴死，由于土质不宜种水稻，到年尾交了‘反修粮’，一家老小还喂不饱。

“这两年农村政策松动一些了，但是山高皇帝远，我申请出国还办了四年，别说关系到亿万农民生计的政策落实了。”他苦笑了一声说，“我来了后虽然一天到晚很辛苦，但到时候至少拿点儿工资可以寄回去。别看老板给我的钱少，攒下来寄回去，嗨，可解决大问题了。”这时他紧锁的双眉舒展开了，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，“解放三十多年了，我们村里还没安上电灯。去年我寄回去三千多镑钱，给全村买电线，安上了电灯。”

“哦，你一年大约挣四千来镑工资，寄回去三千多镑，你自己够用吗？”我惊异地问。

“我吃饭住房不用钱，除了抽点儿烟，整天烟熏火燎地围着锅台转，这些衣服都是我从国内带来的，出去上个街连个话也不会说，穿好的也没用，也没多少时间出去玩儿，我还能有什么开销呢？再说，想起中国的农民那么苦，我当了二十来年农民，攒点儿钱能改善一下他们的生活，自己活着也觉着有点儿用。上个月我又给村里买了台二十四吋的索尼彩色电视机，你说，我要是还在家修地球，能为村里做这些事儿吗？”他越说越起劲，又把椅子向后退一仰，挺起肚子，摇头

晃脑，完全沉浸在一种自豪感中。

我哑口无言了，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我想起了爱国华侨陈嘉庚，但是富家亮不是华侨巨富，而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亲戚剥削的外卖店的小伙计，一个一味只知道干活儿、吃饭的中国农民，却似乎从这种工作中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安慰，发觉自己这样活着还有点儿意义。我心中不禁泛起一种无可奈何的苦涩。

第二周星期二的下午，富家亮又来了，并且用塑料盒子装了几种鸡杂碎——鸡肝、鸡头、鸡脚等等。他说这些东西可不是他自己拿的，而是他老板叫他带给我的。原来他们店里一天要用三十多只鸡，但西人只吃鸡肉，不吃鸡杂碎。上次富家亮回去后向老板提到同我交了朋友，于是他老板叫他把这些鸡杂碎带给我吃，否则也是倒掉了。

晚上十点多钟，我看完了书，估计富家亮的外卖店也快关门了，不会太忙。我来到他们店，仍有很多人在外面坐等着买餐。富家亮的伯父笑眯眯地打开柜台门，让我进到后面的厨房里。

好家伙，这里真是热火朝天。富家亮和那个香港小伙子汗流浃背，分别在两个锅台旁忙碌地炒着菜，他们配合得像一台机器上的各个部件那样有条不紊、快速而准确，紧张得几乎没有喘息的工夫。

我意识到在这种时候不能久待下去，于是同老板寒暄了几句，便告辞要走。这时富家亮说要送我出去，老板点了点头，我们便走了出来。

在店门外，他仰起头，面朝着繁星点点的夜空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，然后掏出一根烟点上，狠狠地吸了一口，

吐出一大口浓烟，才神秘地对我说：

“到晚上一点来钟，你还不会睡吧？”

我从中学时代就喜欢在深夜看书，因此得了“夜猫子”的外号。一点来钟我正好差不多看完了书，出来散散步，然后才睡觉，所以我答道：“还没上床。”

“那好，那时我们老板也差不多走了。他走了以后我给你打个电话，你听到电话铃响了两声后，不用接，直接到我这里来就行了。我有事找你。”

那天夜里大约一点钟，我们房子里的电话铃响了两下，我便出来向富家亮的店走去。

老远我就看到他们店里的灯仍旧通亮着，一个小伙子拿着拖把正在洗地，那是富家亮，没错。他给我开了门，把我引进了厨房。

厨房的门开在整个房间的中部，有两个相对的门，一个与前面的候餐室相通，另一个与后面的仓库相连。厨房的一头是锅灶和备料架；另一头有两张大桌子分别靠着墙，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台大彩色电视机和一台大型三洋牌收录两用机，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盆盆切好的肉料。桌子下面有两大桶“口条”和几小盆削了皮的洋葱。

所谓口条，就是用土豆切成的条，在B国最流行的食物就是炸口条加炸鱼，在每条街上都可以看到挂有“Fish&Chips”（鱼条+口条）牌子的快餐店。B国人把口条当作他们的主食之一，所以即使是中餐外卖店，为了适应西人的胃口，有时也要用口条来作主食。听说在西人的“鱼条+口条”店里，土豆条都是用机器切成的，否则用手是切不出这样大量的口条的。但是我在這間中餐店里却没有看到口条机。

“你们店里有口条机吗？”我问。

“老板舍不得买啊。因为我们不是‘鱼条+口条’店，口条的用量不像那些店那么大，但是每天也差不多要用去这么两大桶口条，它们都是我用手切出来的啊。”

“天哪，多久才能切完这么两大桶啊。”

“至少得两个小时。我先得把每个土豆都削了皮，然后放在手中像这样一个一个地用水果刀切成条，然后还得洗干净。妈的，一早上起来就得干这个。切完口条后还要备肉料和洋葱，紧接着就该开门做中午饭了，老子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！”

我实在很同情他，于是拿起了土豆在水池里削了起来。

“算了，算了，大学生，我不是叫你来帮我做这个的，你也不会做，帮不了我多大忙。来，来，听听这是什么。”他眼中突然发出亮光，脸上也泛起红晕，放下手中的拖把，跑去扭开了收录两用机。

我看到收录机里的磁带转了起来。

“这里是北京电台，现在开始对欧洲华侨的普通话广播……”

我顿时觉得一股暖流从体内往上涌。

“你什么时候录的这些？”

“今天晚上八点半钟我做饭的时候。那时候我没工夫听，把它录下来现在听。现在你可以听到有关祖国的最新消息了。”他激动地说。

“你每天都收听吗？”

“是啊，不过我一般听的是广东话的广播，今天因为也要你听听，所以我录了普通话的广播。”说着他“噌，噌”几下快步跑上楼，又“噌、噌”几步跑下来，递给我一张中文的广播时间表。

“你收着吧，这是我写信从L城的中国大使馆要来的。上面有北京电台用普通话、广东话和客家话对欧广播的时间和波长。”

“你为什么坚持收听北京的广播呢？”

“哎呀，大学生，我不像你啊，我不识半个英文字，看不懂这里的报纸，听不懂这里的广播，若不听听祖国的声音，祖国和世界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哇，这不成了睁眼瞎了吗。告诉你，我在这里如果不听听祖国的声音，整天关在厨房里，哎！真是比在中国的穷山沟里还闭塞啊。”

这时他脸上又发出红光，睁大的眼睛又显得亮亮的，放下手中的活儿，专注地对我说：

“你知道吗，这些时祖国农村的变化吸引我啊！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，实际上就是各家大包干，有的农民自己买拖拉机，自己出钱在村里唱大戏，甚至坐着飞机周游全国，变化大，见效快，前所未有啊！但是也叫人难以相信，可是又不得不信，就连我那个穷侨乡也起了变化，来、来、来，你跟我上楼看看。”

他拉着我的手快步走上楼。

这个外卖店的楼上是一套典型的B国住家单元，一个大睡房加一个小睡房、一个客厅和一个洗澡间。大睡房和客厅通常都锁着，有时家亮的堂姐夫一家人来住住，富家亮只住那间小睡房。

富家亮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单人床、一张桌子，中间小过道横着把椅子，把整间屋子几乎塞得满满的。床头的地上堆着一堆待洗的衣服，屋子里充满了脚臭和汗臭的混合气味。桌子上乱七八糟地堆着一些东西，显然主人没有工夫去收拾。墙上挂着一大张照片，是他和他爱人抱着刚出世的小女儿在